

# 达斡尔族文学史略

赛音塔娜 托娅 著



1209  
127

J209  
127

达斡尔族文学史略

赛音塔娜

托娅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达斡尔族文学史略

赛音塔娜 托娅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1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32 印张:8.75 字数:214千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81015-865-1/I·99

定价:20.00元

## 导 言

达斡尔族(DAOR)<sup>①</sup>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现有121357人口(1990年)。约占我国总人口的万分之一。随着历史的变迁,达斡尔族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生活局面。他们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其中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郊区为主要聚居区。另外有近千名人口分布在吉林、辽宁、北京、天津、上海、陕西、四川、广西、浙江等21个省市自治区。聚居区内除达斡尔族外,还有汉、蒙、鄂温克、鄂伦春、满等民族杂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达斡尔族同其他兄弟民族友好往来、和睦相处,相互学习,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祖国文化。

达斡尔族分布在从黑龙江畔到阿尔泰山脉南麓的塔城地区,各地达斡尔人的分布地区位于北纬45°—50°之间的高寒地带。气

---

① “DAOR”,系民族名称的达斡尔语记音拼写。有关达斡尔族记音符号在“语言文字”部分介绍。本书中有关达斡尔语均以记音符号拼写。

温较低,冬季较长,是这一地区气候的主要特点。北国的冬季多雪,为猎人、牧民在深山密林中跟踪追击野兽提供了方便。达斡尔族居住地区地形多种多样。布特哈达斡尔人居住在嫩江上游,嫩江是我国东北四大河流之一。这个地区是大小兴安岭的支脉,群山峻岭之间,蜿蜒流淌着大小河流,山水相间,纵横交错。兴安岭上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有落叶松、红松等针叶林和桦树、柞树、杨树等阔叶林。森林中栖息着各种飞禽走兽,如老虎、熊、野猪、鹿、狍子、狐狸;还有天鹅、雁、鹤、野鸡、沙鸡、飞龙等。这里的达斡尔族人民长期以来从事渔猎生产活动,因而,在历史上将这一地区称为“布特哈”<sup>①</sup>地区,即狩猎生产活动地区。齐齐哈尔达斡尔人则居住在嫩江中下游,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冲击平原,是松辽平原的一部分,土质肥沃,适于农耕、放牧。这里盛产五谷杂粮和各种蔬菜,江河里盛产各种鱼。海拉尔达斡尔人分布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东部边缘,约在海拉尔城的东面和南面,他们主要从事牧业生产。新疆达斡尔人分布在阿尔泰山南麓的丘陵地,主要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这种多种多样的地形和自然环境,决定了达斡尔人独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

我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单就北方民族的文化来说,长城以南是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农业文化的发祥地;长城以北,曾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草原文化地带,这个地带主要包括松辽平原、蒙古高原至阿尔泰山下。在它的北面,则是渔猎文化区域。从达斡尔族居住的地区来看,原来居住于黑龙江流域,十七世纪中叶迁移到嫩江流域,这种地理位置上的特点,使他们正处于农业文化、渔猎文化、草原文化交叉的地带,从而形成了达斡尔族文化上的多元性。这不能不反映到他们的衣食住行中,反映到口头文学中。

达斡尔族的村落选择依山傍水之处,村落的北面是山林,东西

---

① 布特哈:达斡尔语,原意为狩猎生产活动,亦可泛指攫取自然界现成果实的各种生产活动。

南三面是开阔的草甸子,村落位于山的阳坡或岗地上,靠近江河。他们的村落大者上百户,小者几十户,院落东西两侧或北面按排园田,用细柞木或柳条编篱笆,将园田围起来。每家都用树木埋杆成围障,或用柳条编篱笆、或用木板修屏障。住房一般用桦木、松木为栋梁,土堡为墙,房顶呈人字形。居室中以西为贵,并有他们传统的坐卧惯例。西屋又以南炕为贵,炕头为男性长者起卧之处。过去,西炕曾是室内祭神的处所,西窗框上侧放置神龛。在饮食方面,食物品种和食用方法多种多样,主食有米食和面食,副食有鱼类、肉类、奶食类和各种蔬菜。此外还有一些野菜,尤其是柳蒿菜是达斡尔人传统的野生菜食。服饰习俗方面,过去是由狍皮、羊皮、少量布匹制成。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布匹成为他们的主要衣料,有些寒冷地区羊皮也成为防寒的衣料之一。从婚姻习俗来看,达斡尔人实行一夫一妻制,而且一直坚持着氏族外婚的传统制度。达斡尔人素有重礼仪、敬老爱幼、热情好客等传统美德和良风益俗。在信仰习俗方面,达斡尔人信仰萨满教,所供奉的神共有十多种。新疆塔城地区和内蒙古海拉尔地区的一些达斡尔人,虽然也信仰喇嘛教,但不如信仰萨满教那样虔诚。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文化和医药卫生事业的逐步发展,达斡尔人对萨满教的信仰正在逐渐淡化。

## 语言文字

达斡尔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达斡尔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它划分为四个方言,即布特哈方言、齐齐哈尔方言、海拉尔方言和新疆方言,其中布特哈方言还分为四个土语。达斡尔族文化的多元性,同样也表现在语言文字中。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发现现在的达斡尔语和十三世纪以前的蒙古语有许多相同的词汇,而现在蒙古语中已有很大变化。达斡尔语中保留的古蒙古语说明两个问题:一说明达斡尔人的祖先曾与蒙古族先民相邻而居,否则不会

有这种情况；二说明达斡尔语是一个古老的语言，现在的达斡尔语是从古代达斡尔先民的语言变化和发展而来的。随着达斡尔族社会的发展，达斡尔语一方面按着本身的规律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急剧发展的达斡尔族社会的需要，吸收了不少满——通古斯语族及汉语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词汇。达斡尔语吸收鄂温克、鄂伦春语的借词自不必多言，单就满语、汉语而言，对达斡尔语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与满、汉两族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达斡尔族在清代以前无文字。据文献记载，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达斡尔族地区才有了学校教育。起初，主要是学习满文。从清朝末年以后，学校教育才从满文教学转向以汉文教学为主。也有的地方学习过蒙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等。学校教育的兴起，使达斡尔族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汉族的一些古典名著的满文译本开始在达斡尔族中广泛流传，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今古奇观》等，许多人物形象对达斡尔族群众来说并不陌生。达斡尔族的民间口头文学也借助满文拼写达斡尔语得以记载、流传，还有一些历史、军事和文学方面的著作也相继问世。自从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汉文的学习，开始为达斡尔人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开辟了更为直接的渠道。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说，许多知识分子借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记录并创作的“舞春”（叙事诗），都较好地反映了达斡尔族社会现实。“满文字母记达斡尔语音”的运用，客观上起到了达斡尔文字的作用，减少了因无文字而受到的种种限制。它对达斡尔族民间文学的创作、传播和保存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满文字母记达斡尔语音”是达斡尔族人民创造才能的一种体现，它也标志着达斡尔族文化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至今在达斡尔族民间仍保存着不少用满文拼写留下的叙事诗、家谱（达斡尔人称 giab）、史书等。解放后，达斡尔族老人中仍有不少精通满文者。最为突出的是，已故达斡尔族文人志士、当时任莫力达瓦旗副旗长

的孟希舜先生搜集、整理的40首舞春,都是以满文记达斡尔语音印成册的,为后人学习和研究达斡尔族舞春做了奠基性工作。

汉语汉文、蒙文、哈萨克文的使用,在达斡尔族民间文学的搜集、翻译、整理、出版工作中也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汉语汉文起的作用更为突出。纵观有关达斡尔族故事集、民歌选,大都是译成汉文出版的,这一方面说明达斡尔族知识分子汉文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民间文学的风格、语言特色用其他文字出版的书,同样不利于其民族特色的表达。

达斡尔族的有识之士,很早就探索过创制文字的事宜,但始终未能成为现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得到恢复和贯彻落实,达斡尔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和创制文字工作重新受到重视。1980年4月,内蒙古达斡尔学会(当时称“内蒙古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在呼和浩特成立。该学会根据恩和巴图起草的《达斡尔语记音符号》,成立了巴达荣嘎、恩和巴图、孟志东三人组成的技术小组,对该记音符号进行审查修改。该记音符号是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制定的,字母形式及读音方面,和《汉语拼音方案》一致,并规定了适合达斡尔语言特点的拼写法。这一记音符号的制定,对搜集、整理、研究达斡尔族文学提供了方便条件。我们在本书中就使用这套记音符号对有关词汇予以标音,以便体现出达斡尔语中的原貌,也便于国人了解达斡尔族语言、语音格律等方面的特点。

## 达斡尔族社会历史简介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研究达斡尔族的文学,首先必须对达斡尔族的社会历史有所了解。

介绍达斡尔族的历史,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族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早在18世纪下半叶,清乾隆皇帝钦定《辽史》重印本,将契丹贵族大贺氏与达斡尔族联系起来,这是探索达斡尔族族源的开始,至今已有200来年了。国内外学者也都曾对达斡尔族族源进行过研究。不少本民族知识分子为探讨民族的族源,都曾著书立说各抒己见,这类著作共有7部,较早的有清道光十三年华灵阿的《达斡尔索伦源流考》,最晚的是1933年孟希舜的《达斡尔民族志略》。这些学者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蒙古说、契丹说、落俎室韦说、东胡说、北室韦说。目前,在这个领域中契丹后裔说影响较大。清代以来,自从乾隆皇帝将《辽史》中的“大贺氏”与《八旗姓氏通谱》中记载的“达呼尔”联系起来后,即认定“大贺氏”就是达斡尔的先民。之后,又有一些地方史志也认为达斡尔族是辽代契丹族的后裔。还有一些国外学者也提出此种见解。解放后几十年以来,族源问题仍是达斡尔族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前些年出版的《达斡尔族简史》<sup>①</sup>在分析考证各家之说后,进一步阐述了契丹后裔说。然而,至今对此族源问题的讨论仍未结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的搞清族源,才能更好地研究达斡尔族各门学科,尤其是研究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背景、规律,才能写出真正地达斡尔族文学发展的历史。现在,根据达斡尔族史学研究的现状,我们只好采用性质模糊的史概括合体的体例来编写此书。

元明两代的达斡尔族。黑龙江中游地区,曾是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和部分满族世代生息的地方。这里在元代是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属地。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将其疆域分封给他的宗亲和功臣。当时,聚居在大兴安岭西北部地区

---

① 《达斡尔族简史》编写组,《达斡尔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的达斡尔人,受拙赤哈萨尔管辖;有一部分达斡尔人居住在黑龙江中游,则属于“林中百姓”。

从1370年至1388年,明朝的势力推进到贝加尔湖一带。居住在大兴安岭西北部的达斡尔族人民,陆续迁移到黑龙江以北的地区。自明初以来,达斡尔人分布在西起贝加尔湖,东至牛满河,北自外兴安岭,南达黑龙江的广大地域。明朝统一东北地区之后,这里是奴尔干都指挥司的辖区。同时,在辽东开原、广宁等地开设贸易市场,促进了达斡尔人民同各族人民之间的物资交换,促进了达斡尔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17世纪中叶,明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满族已崛起于白山黑水间,并在努尔哈赤及其后继者皇太极的统率下统一各部后,又向黑龙江流域发展。1640年初,皇太极派兵征服黑龙江中游地区,当地达斡尔人同鄂温克人一起,在其索伦部首领博木博果尔率领下,进行了反征服的自卫战,经半年的时间,因力量悬殊,自卫战争最终还是失败了。从此,清朝便将达斡尔族开始编入八旗组织中。17世纪后半叶,清军征服索伦部的战役刚结束,达斡尔族人民所受的战争创伤尚未医治,沙皇俄国向东扩张者的侵略又接踵而来。自17世纪40年代起,直到80年代末,沙皇东侵和清朝保卫我国东北边疆的斗争持续了半个世纪。在这场战争中,达斡尔族人民前仆后继,为保卫祖国边疆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战罗刹》(评书)及《玛瑙石》等作品都反映了他们当时的情况。

17世纪五、六十年代,达斡尔人陆续从黑龙江左岸南迁嫩江流域,这对达斡尔人来说,是地域方面的历史性变迁。这个时期,正是满族统治者入关统一全国的年代,清政府不得以将达斡尔人迁居到嫩江流域,一方面是为了断绝俄国侵略者的粮源,以求边界的暂时安定。另一方面想以达斡尔、鄂温克人充实黑龙江地区的军事实力。从达斡尔族角度来说,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乱后,这也正符合他们寻求安定的愿望。然而,随着八旗制度的实施,对达斡尔等族

实行测丁制,凡年满十五岁的男子,都注册为壮丁,开始服兵役、徭役和纳贡等义务。这些给达斡尔族人民带来了许许多多的不幸和灾难。这些在口头文学中也有充分地反映,如《奇三和孟库胡图林嘎为民伸冤》的史实传说、《博坤绰》、《送夫从军》等作品就产生在这个年代。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渗透,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03年中东铁路<sup>①</sup>通车后,加深了民族内部贫富的两极分化、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再加上奸商和高利贷的盘剥、官吏的压榨,终于造成了民国初年齐齐哈尔地区达斡尔人民反封建反压迫的武装斗争。这次的武装斗争从1914年到1916年,约历时两年。大长了达斡尔族人民的志气,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奸商的威风,但终因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这次的斗争遭到失败。达斡尔人民将此事编成叙事长诗《绍郎和岱夫》世代传唱。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影响下,达斡尔族人民为了求得民族平等,求得解放,大批有志者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他们和蒙古族等兄弟民族一起,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和压迫的斗争。1908年呼伦贝尔地区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反对封建军阀大汉族主义压迫的武装斗争,维护了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力,武装各族牧民,消灭了由日本特务背后支持的色布精额匪军,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民国年间,齐齐哈尔地区以孟绍郎、孟岱夫为首的农民武装起义,也是达斡尔族贫富两极分化加剧,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继这次武装起义后,在布特哈地区掀起了反对封建军阀大汉族主义统治的斗争。他们于1929年末,自发地组

---

① 中东铁路是根据1896年签订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由沙俄修筑的。以哈尔滨为中心,东西干线自满州里经哈尔滨至海参威,南北干线自哈尔滨经长春、沈阳至大连,全2800公里,纵横东北三省。从1897年8月动工修筑,至1903年全线通车。

织了一支民族武装——山区自卫大队，他们为抵抗军阀势力，保卫家乡安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革命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此，达斡尔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也走上了新的发展时期。许多达斡尔族的进步青年接受革命思想，参加争取内蒙古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1931年后，达斡尔族人民与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区各族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14年殖民统治。各地达斡尔族青年参加抗日义勇军、为东北抗日联军运送物资，当向导、掩护伤员，积极投入了抗日斗争中。抗战胜利后，达斡尔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卫胜利成果，建立人民政权，进行了民主改革。新中国成立后，给达斡尔族人民带来了新生，从此过上了有吃有穿的幸福生活。并于1958年8月15日成立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1988年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恢复，还有其他的一些民族乡、民族区，这些都保证了达斡尔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达斡尔族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 民间口头文学的搜集、翻译、整理、 出版与研究概述

解放以前，有些达斡尔族古籍和一些个人保存的手抄本外，几乎没有见到正式出版的书籍。解放以后，达斡尔族同其他民族一样在政治上得到了平等的权力，达斡尔族的文化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并逐步开始了对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进行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的工作。50年代中期，达斡尔族语文工作者就曾深入民间，搜集了不少故事，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故事集。但是，更大量的工作是在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的。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导下，达斡尔族民间口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才逐渐地走上了正轨，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个时期，达斡尔族口头文学作品集相继问

世,主要有孟志东的《达斡尔族民间故事选》、呼思乐、雪鹰的《达斡尔民间故事》、萨音塔娜的《达斡尔民间故事选》、娜日斯的《达斡尔民间故事百篇》、苏勇的《达斡尔民间故事专辑》;在民歌方面有杨士清的《达斡尔族民歌选》、何今声的《达斡尔传统民歌选》、巴达荣嘎、门德苏荣的《达斡尔族民歌选》、白杉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歌》;还有塔娜、陈羽云合译的《敖拉·昌兴诗选》、奥登挂、呼思乐合译的《达斡尔传统诗歌选译》、毕利德等人编著的《达斡尔族传统文学》等等。近几年新出现的评书《战罗刹》(包括《黑龙江上游是我们的故乡》、《独立自主的十四年自卫战》、《雅克萨城三次争夺战》、《惨绝人寰的海兰泡大屠杀》、《骇人听闻的六十四屯大惨案》),还有《奇三告状》等两部。由于不是达斡尔族传统体裁,也由于原声带收到的较晚,本书中无法评说,待以后介绍。其内容是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这些书籍的出版,为我们全面了解达斡尔族口头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是本书引用的基本资料。故,当我们写作本书时,心中默默地感激达斡尔族的民间文艺家和为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做出过贡献的人们。本书的写就应归功于他们的辛勤劳动、执著的笔耕,如果没有他们提供这些丰富的资料,达斡尔族民间文学园地将是一片空白。特别让人幸慰的是,呼思乐、雪鹰的《达斡尔民间故事》、孟志东的《达斡尔族民间故事选》、杨士清的《达斡尔族民歌选》、塔娜、陈羽云的译著《敖拉·昌兴诗选》等可谓是精品,均具备科学性、可读性、欣赏性为一体,较好地体现了原作的风貌。

在研究方面,十多年以来,有关达斡尔族口头文学方面的介绍、评论、论述的文章越来越多,均在地方、全国性报刊上发表。一支以科研单位为骨干,以各个达斡尔族聚居地方及自治县为基础的科研队伍正在形成,成为我国口头文学研究队伍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民族所、内蒙古大学等单位均有从事达斡尔族口头文学的专业或兼职

研究人员,也有的是在研究历史、研究语言的同时兼研究口头文学。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也有从事达斡尔族民歌研究的学者。

目前,有关达斡尔族文学研究的学术团体有:内蒙古达斡尔学会,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及新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等地均有达斡尔学会,有专业、非专业人员在辛勤地工作。这些学术团体都定期召开学术讨论会,其中不乏有关口头文学的论文。所有这些活动都积极促进了达斡尔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推动了达斡尔族口头文学、书面文学的研究。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仍有许多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有待于我们去抢救、挖掘。尽管为时已晚,目前的当务之急仍是抢救达斡尔族老人记忆中的口头文学作品。如果再去抢救,将会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千古恨”,这种难以挽回的“千古恨”是令人痛心的。我们必须利用大好时机,进一步组织力量搜集、整理好祖宗们留下的这部分遗产,同时用各种学科的知识去研究总结达斡尔族文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从而向我国丰富的民间文学理论交出“这一个”的答卷。

## 达斡尔族口头文学的民族特色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达斡尔族创造了自己民族的灿烂文化。达斡尔族口头文学不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别具特色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达斡尔族人民的审美情趣和文化追求,它不仅直接地反映了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而且直接表现人民对生活的态度、思想、感情和愿望。达斡尔族口头文学受到本族人民的欢迎,历久不衰,这是由它的民族性决定的。其民族特色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题材内容。达斡尔族口头文学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独具的特色和风格。民族性是达斡尔族口头文学

的重要特征,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口头文学的一个主要标志。达斡尔族口头文学为我们展现了达斡尔族人民的民族心理、宗教信仰、风俗民情等等。即便是从其他民族吸收过来的口头文学作品,经过民间艺人们的加工改造,已汇入达斡尔族口头文学的长河中,变成了具有达斡尔族风格的作品,如《相思的鸿雁》、《大萝卜、胡萝卜、水萝卜》、《宝布和莎佳》、《卖香屁》等故事,都可以从汉族《梁山伯与祝英台》、《大灰狼的故事》、《叶限》、《卖屁屁香》(狗耕田型故事)中找到其来源。但是,达斡尔族人民已将其改编成符合自己口味的作品,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物语言、人物性格方面,都已发生了变化,都具有了达斡尔族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情感。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的作品直接取材于达斡尔族社会历史、人民的生活之中。特别是有些人物传说、史实传说,都直接取材于达斡尔族历史中的真人真事,如《萨吉哈尔迪汗的传说》、《奇帕的传说》、《奇三和孟库胡图林嘎为民伸冤》、《绍郎和岱夫》(叙事长诗)、还有关于红军的故事等等。这些作品不仅是一般的故事,而且也是很优美的口头文学作品。达斡尔族人民就是这样歌颂本民族的英雄人物、反映本民族重大的历史事件。

达斡尔族口头文学中还深深地打上了民族信仰的标记,即具有浓厚的萨满教色彩。达斡尔族民间文学之所以有这种色彩,当然有它们的社会背景、历史根源。萨满教是以万物有灵、灵魂不灭为基础以及与一系列狩猎、捕鱼、巫术活动相结合的原始信仰。它是原始社会渔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反映达斡尔先民曾从事捕鱼、狩猎等物质生产活动,也反映了他们的原始世界观。从社会发展上看,史前文化发展的各阶段中,野蛮低级阶段以前,各民族的发展不论是北方、中原、南方,都曾经历过采集、捕鱼、狩猎经济的共同道路,因此黄河以北各民族的萨满教与中原巫教、南方民族的原始宗教之间必然有其共同点。但是到了野蛮的低级阶段,我国黄河流域南、北,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的不同,在经济发

展上是有差异的。黄河以南,中原和南方各民族,由于地处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暖,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因而他们的原始宗教便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原始宗教类型。黄河以北阿尔泰语系各古代部落,由于地处草原、森林的寒冷地带,仍然保持着萨满教这一上层建筑。这样,南方和北方的原始宗教之间便产生了差异。这种世界观上的差异,也影响到我国南北方,使之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文化。达斡尔族和北方各民族一样,长期生活在寒冷的地带,一直从事着渔猎生产,同样保持了萨满教这一上层建筑,因此达斡尔族民间口头文学也带有萨满教信仰的色彩。

从达斡尔族的历史来看,又有它独特之处。他们居住在我国黑龙江一带,长期以来很少与世交往,在社会组织中宗法式的氏族制度一直占居着主导地位。因此形成了达斡尔族在信仰上的原始性和稳定性。当达斡尔族从黑龙江左岸南迁到嫩江流域时,达斡尔族仍保持着这一信仰。当时,虽有异教的包围、冲击,但萨满教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因此萨满教的世界观渗透于达斡尔族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于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中,渗透于当时的社会组织中,渗透于他们的传统习惯和道德中,渗透于流传在民间的口头文学和艺术创作中。因此,在达斡尔族口头文学中,往往带有萨满教的崇拜特色,从而形成了达斡尔族口头文学的独特风格。

在达斡尔族神话、传说、故事、莫日根故事、民歌(尤其是仪式歌)中也都印有信仰的标记。

首先,达斡尔族传说故事中,有很多自然崇拜的内容。在大自然崇拜中,崇拜天体、动物是比较典型和突出的。远古,处于野蛮状态的达斡尔人的祖先,和一切原始人类一样,在他们的观念中“腾格里”(tenger)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他们和北方信仰萨满教的各族一样,称神为“腾格日”。这是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观念。他们在研究既往,探索历史的时候,认为自己是“代尼

乌音(Daain ugin)和猎人”的后代;并认为氏族和部落的生存和发展,同样受到“腾格日”的主宰。这种对“腾格日”崇拜的观念,充分反映在《天为什么下雨和降雪》、《代尼乌音和莫日根》等神话中;也反映在祀典歌、莫日根故事中。达斡尔人的祖先、崇拜自然又是多方面的,除了天体崇拜外,对动物的崇拜也是比较突出的。崇拜对象有熊、蛇、鸟、鹰、老虎等凶猛有力的禽兽,在《老虎报恩》故事中,老虎保护伙夫,给他送来了好多贵重的野兽,并且帮助他回到家中;还有《召思莫日根和张丽花卡手续》故事中,老头儿的名字叫“阿提热坎”(公熊),老太太的名字叫“额提热肯”(母熊)。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虎和熊顶礼膜拜的程度。

其次,达斡尔族传说故事中,还有“ongoor”(神灵)崇拜的内容。阿尔泰语系与通古斯语系各族的萨满教,均将崇拜的神灵称之为“翁贡”。达斡尔人称“翁古热”。他们崇拜的“翁古热”很多,概括起来有三类:

动物类翁古热,主要有雄鹰、熊、老虎、狼、羚羊、马等等。如:《德莫日根和齐尼花哈托》中,齐尼花哈托(萨满)的神灵有两只金钱豹,一条白蛇和一条黑蛇,水鹿,两只金凤凰;梅花哈托(萨满)的神灵有一对梅花鹿,一只独角水山羊,一对野鸡,两条飞蛇。

植物类翁古热,其主要特征是对大树的崇拜。如:老松树、臭李子树、老柳树、桦树等等,均为崇拜的对象。如在《毛都雅德干和莫日根》故事中;一位老猎人出外打猎,来到一棵大榆树下露宿,忽听一位小杨树请老榆树给它妈妈看病,而老榆树为了保护猎人没去。这里表现出达斡尔人对树的崇拜。我们知道,古代的达斡尔人一直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经常和动物、森林打交道。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崇拜以树为中心的植物类翁古热也是很自然的,充分显示了“森林文化”的特征。

祖先类翁古热,也是古代达斡尔萨满教的重要特征之一,达斡尔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祖先神,他们称为“hojoor barkan(祖神)”。